

王明蓀著

宋遼金史論文稿

明文書局印行



宋遼金史論文稿

王明蓀著

明文書局印行

## 作者簡介

王明蓀，字子明，號喬齡，湖北當陽人，生於民國卅六年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，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碩士，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，現執教於中興大學歷史系。研究範圍為宋遼金史、元史，中國「胡漢」關係史，中國思想史等。曾出版專書有「早期蒙古游牧社會之結構」、「宋遼金元史」、「鐵木真」等。

## 034 宋遼金史論文稿 王明蓀著

中華民國七十年十二月初版

出版者：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人：李 潤 海

發行所：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二段21號9樓之4

電話：三九五—三九六

郵撥：一四三六七八號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字一九九三號

定價：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整 平裝一冊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## 自序

對本國史的研究，我較注重宋元這一段的歷史，這段歷史有個顯著的特色，就是外族勢力的強盛，凌駕中原漢民族的朝廷。本來中國歷史上各朝代皆有所謂邊患，中原與外族間彼此的戰爭、和平，及勢力之消長，是一個長期發展的歷史，民族、文化的衝突與融合，都是「胡漢」關係的研究內容，這也是我幾年來讀書、教書的主要課題。

我始終覺得中原與外族間的歷史關係，有愈來愈廣大及複雜的趨勢，也可以說這種現象在歷史中的比重有增加之勢，最顯見的是自「五胡亂華」始，華北可說是外族天下，而華北的漢人在外族統治之下，彼此的關係就是很重要的研究課程，隋唐統一時期，無論在政治、社會、文化各方面，都明顯有「胡漢」的淵源及融合的構成，這些已有前輩學者的論述而毋庸置疑的。唐朝崩亡，中國又度割據分裂，外族勢力再興，威逼中原，而且接續不斷達三、四百年之久，這就是宋元一段的歷史。契丹、女真、蒙古的強盛；從燕雲之地的淪沒，到淮河以北的失陷，以至整個中國亡於外族之手。後來漢人建明朝，但北方外族威脅未消，及至滿州代興於塞外，終又入主中原以治天下了。

當然研究宋元的歷史，並非研究「胡漢」關係才是最重要的，其餘還有許多重要的題目，不

W36/06

過這只是個人的研究方向而已。近幾年來在歷史系講授宋遼金史、元史等課，教學之餘，將讀書所得寫成論文數篇，都是連續幾年的研究，在師友的鼓勵下，取有關者彙為一集付梓，唯才疏學淺，還望讀者能多賜教為幸。

文化學術工作是任重道遠之職志，明文書局的李潤海先生與杜潔祥兄能始終不渝此志，又際此出版界不景氣之時，而慨允出版這本文稿，在對他們表示敬佩之餘，也致衷心的謝意。

民國七十年冬王明謙序于遲晴樓

# 目 錄

- 一 契丹與中原本土之歷史關係……………○○一
- 二 金初的功臣集團及其對金宋關係的影響……………○三三
- 三 略論遼代的漢人集團……………○六三
- 附錄一 遼代聘使漢人人名略表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- 附錄二 遼代漢官人數表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- 四 宋代鐵礦產量的初步探討……………一二七
- 五 北宋中期以前役法的改革論……………一三九
- 六 王安石的王霸論……………一五七
- 七 談宋代的宦官……………一七九

## 契丹與中原本土之歷史關係

### 一、契丹初興時之北亞草原

契丹民族最早見於漢文記載者，爲魏書所說：「契丹國在庫莫奚東，異種同類，俱竄於松漠之間」（註一），而庫莫奚在魏書中說是其先世乃東部宇文別種（註二），除此外，在隋書（註三）、北史（註四）、舊唐書（註五）、唐書（註六）、五代史（註七）、五代史記（註八）等皆有專傳記載，雖然對契丹民族先世之說法間或有異（註九），但諸史皆以其爲長城之外的游牧民族視之，我們再以諸史所載其活動範圍與生活習俗來看；契丹正是中國傳統歷史中，與中原農業民族相對峙的許多北亞游牧民族之一，在勢力未強盛時，活動的範圍略偏向於中國的東北，大致在今吉林、遼北、遼寧、熱河一帶。元魏時，在契丹的周圍還有許多其他的民族，如高麗、奚、勿吉、室韋、庫莫奚等，然而當時能控制北亞及中國北方的政權則爲柔然與元魏。

在西元三世紀的末期開始，國史中的五胡亂華時代，使華北擾攘百年之久，西元四世紀末期，鮮卑的拓跋氏興起，拓跋珪建北魏政權，控制了北方，南方的劉裕篡晉爲宋，遂開南北朝之局。北魏原係北亞之游牧民族，在五胡亂華時期也參與中原之逐鹿，拓跋珪乘強權符秦淝水之敗乃

興起，西元三八六年自立爲代王，大會諸部於漠南之地，都盛樂（綏遠和林格爾），改國號爲魏，滅國擴土，三九八年稱帝，都平城（山西大同），勢力漸南進中原，在他以後的繼任者拓跋嗣、拓跋燾等，逐漸統一華北，當時的北魏，不但是長期統制北方的非漢族政權，也同時是大漠南北諸游牧民族的共主，然而拓跋氏的入主中原，大量採行漢化，用漢法漢制，不久，他們就被同化於廣大的漢人之中，也就成爲了國史中北方的漢人政權一樣，當這個北亞游牧民族進入中原而成爲漢地的政權之後，原來大漠南北之地成爲權力真空狀態，接着填補進原來的勢力則爲柔然民族，柔然對北魏來說，就成爲北亞游牧政權與中原漢族政權的關係了。

柔然的先世說法不一，南齊書說是塞外雜胡（註十），梁書說是匈奴別種（註十一），魏書說是東胡之裔（註十二），不論如何，柔然正是北亞的游牧民族，當拓跋魏強盛時，柔然是臣服其下的衆多民族之一，諸史中所說的芮芮、蠕蠕，卽爲柔然，其所居之地正爲匈奴故地；南鄰北魏，東近朝鮮，北踰大漠，西及焉着。北亞游牧民族之消長兼併一如中原的漢族政權；北匈奴西走，鮮卑據其地，而鮮卑南進中原，臣屬於北魏之柔然，並未隨之南下，反而在其北境擴展勢力，興起於北亞，漸成爲北魏之邊患，終有魏太祖拓跋珪之出擊，大破柔然，以及突厥系之高車、袁紇。柔然遠遁漠北，在其領袖社崙領導之下，又度重振於北亞，併高車諸部，整軍立法，大破西北匈奴之國，國勢大強，自號丘豆伐可汗（註十三），儼然爲控有北亞的政權代表，當然又度構成中原北魏的北方強鄰，雙方對峙間的和戰以及各自內部政權之變亂轉移，正如秦漢之於匈奴



的形態。

契丹起初有奇首可汗者，其地在黃河之西，土河之北（註十四），早期的歷史資料非常缺乏，當柔然與北魏對峙之時，也同於其他各民族時而求臣於二大勢力之間，又常受到高麗、柔然的侵逼。當西元六世紀中葉，北亞草原有突厥漸興起，取代柔然而雄長大漠南北，其勢力所及影響於中原本土，隋唐之際更爲強大，契丹生聚於北亞，也臣於突厥，當初，契丹又夾於兩大之間，亦分別款表稱屬，但契丹也時而侵入唐境攻城略地，也時而反抗突厥之統轄，同時還常與他族爭戰以擴充勢力，然則必竟這與契丹同生聚於北亞草原的突厥的壓力，要遠較出自中唐帝國的漢族王庭來的巨大與急迫，在貞觀二年，契丹領袖摩會降唐，這種草原民族叛附農業民族的舉動，很使身爲北亞共主的突厥憤怒，突厥要求以由漠地北奔的梁師都來交換摩會，爲唐太宗所拒，契丹乃受中原朝廷之保護，並助唐伐高麗，一時雙方關係不錯。到窟哥爲契丹領袖時，更舉部內屬，唐特置松漠都督府以之爲使，持節十三州諸軍事，並封爵無極男，賜姓李氏（註十五），這時的契丹，如同唐邊鎮守的一方之鎮，但親漢的窟哥死後，契丹又與另一游牧民族奚族聯合叛唐，雖然亂事很快結束，也可看出游牧民族之內屬稱臣，應有幾點原因：一、爲本身受到其他游牧民族強權之壓力，如摩會、窟哥。二、爲本身內部政權之分裂，欲依中原朝廷爲援，如南、北匈奴，東、西突厥。而內屬於中原之游牧民族，也有以和平方式表顯出來，未必盡如漢族史載之臣服，如此的情況，乃因雙方對和平通好觀念之差異所致，或許在游牧政權表示休戰通好，而在中原

則認爲是威服稱臣，畢竟游牧民族的領袖們有機會獨立之時，大多不以內屬於中原朝廷爲適合他們的生活方式。窟哥死後，契丹與奚之叛唐，應是如此，國史中各朝代的邊患頻仍，也應是如此，尤其當他們受到漢族的岐視與壓迫時更是如此。武后萬歲通天元年（六九六年），契丹受營州都督趙文翹之迫，乃興起大規模之叛亂，窟哥之孫李盡忠，以松漠都督自號無上可汗，與別部領袖孫萬榮以歸誠州刺史同反，武后以二十八將領大兵往討不利，李盡忠不久卽死，其部衆又受到突厥的乘機侵襲而破散，契丹這次的反唐運動，乃全歸於孫萬榮繼續領導，最後的結果是唐以衆兵聯絡契丹近鄰的奚，首尾夾攻，終使孫萬榮不支而敗死。契丹這次對抗中原朝廷，所受到壓力最大的敵人，還是來自生聚之地的北亞草原，先是突厥，後是奚，這對游牧民族而言，是內部的敵人。契丹此後元氣潰散不能自立，乃依附了突厥（註十六）。而後內部爭權襲立，由可突于的稱雄各部，到李懷秀的降唐、叛唐，大多是受到中原政權壓力的控制，天寶時期，李懷秀領契丹叛唐，時安祿山正爲唐邊藩鎮，發大兵討契丹失敗，此後，雙方相峙爭戰，勝負互見，但最後是安祿山獲得勝勢，他似乎是解除了這個背後的壓力，乃敢於大舉叛唐而南下，這在中原的漢族政權正開始一場動搖國本的政治風暴，安史亂後的唐帝國遂長期陷於武人割據的局面，雖然漢族朝廷的危機已顯，但在中原之外的諸非漢族政權，尙不能入侵中原本土而取代之。回紇、吐蕃、南詔等，對唐室的壓力仍要大於北方的契丹，契丹諸部有受唐召撫者，也有叛唐襲邊者，也有游牧自立者，大體來說，安史亂後的契丹，因北方諸鎮割據勢力之阻，不能與中原朝廷有直接關係，

而與河北諸鎮才有爭戰和平的關係，契丹的勢力終究在唐亡之前未能進越河北，一方面契丹實力不強，不但要應付來自中原的討伐，還要周旋於北亞諸民族的自相侵襲，一方面也實因中原漢族政權的強大，鞏固邊防，天寶之後的邊鎮又大多是變相的「胡人」集團，也是當時最具勢力的地方政權，因此，即使是在唐末，中原變亂相乘，而長期與唐帝國爭戰的契丹，就始終未能進入河北之地。

## 二、耶律阿保機時代

唐末的契丹，正是處在一個轉變的時代，中原政權的不穩定，契丹本身的發展力不強，八部各部的大人似乎也推舉不出一個強人來領導契丹此後之方向。五代史中的記載說：當時劉仁恭據幽州，他對契丹有很深的了解；「選將練兵，乘秋深入踰摘星嶺討之，霜降秋暮，即燔塞下野草以困之，馬多飢死，（契丹）即以良馬賂仁恭以市牧地」（註十七），這是劉仁恭代表漢地政權對契丹的政策，是很成功的戰略，乘着冬臨之前予以襲擊，契丹受到損失，而秋暮冬臨，需要補充物質，又遭到燒荒政策有計劃的打擊，契丹的生計受到嚴重的威脅，尤其是馬匹的損失，使契丹在日常生活中，和依賴之以為游牧機動性的戰術中，無法發生作用，因此，身為八部大人的契丹領袖，遙輦部族的聲望頗受非議。時耶律阿保機為其本部的大人（夷离堇），他的能力及名望開始在契丹各部中崛起，主要的表現在於其征討收服附近各地的勢力，這其中包括有室韋、奚、

女真等塞外各部族，以及河東、河北中原等地州郡，重要的是契丹南方勁敵劉仁恭，曾數度遭到阿保機的擊敗，而中原境內河東李克用，汴京朱全忠等割據強權，皆與之聯好，這樣一個能振奮契丹人心士氣的領袖，在游牧民族的傳統中，往往會得到全體部衆的擁護，當遙輦部最後一任可汗痕德堯死後，耶律氏的阿保機自然而然的受推戴爲八部的大人（註十八）。

阿保機時代，可謂契丹初興而強盛的時代，當時的亞洲大勢，在東南的中原漢地，正是藩鎮擁兵自雄，沿唐末以來割據的形勢。一向爲北亞強權之東、西突厥，回鶻等，也都衰亡式微，似乎大漠南北又成權力真空，阿保機的迅速崛起，也立刻填補了這真空，當然，北亞草原各民族的爭取權勢不斷地在進行，阿保機一則要設法鞏固在契丹本身的領導權，二則要繼續擴張契丹之勢於大漠南北，三則要乘中原本土之分裂而南進關內。在第一方面，他採取當時反傳統的方式，大量收撫河北各地北亡出關的漢人，並將所攻陷漢地州縣，俘獲其人民財產而徙置於其個人控制之下的漢城，促成了民族融合，生聚相聯的集團（註十九），他還重用了一些漢人，如韓知古（註二十），康默記（註二十一），以及後來的韓延徽（註二十二）等人。這些措施足以擴大其政權基礎，也適足以被當時契丹內部認爲是違反傳統的，因爲這在游牧民族的眼光中，無異於是傾向於中原本土的漢化集團，再加上另一個契丹的傳統習慣中，對於可汗領導權之年限妨礙了阿保機的政治野心，他又有意不遵守這傳統，當然遭受到其他諸部的聯合抵制，迫使他在沒有把握憑當時的實力平服諸部之時，不能不考慮這個來自契丹內部的強大勢力，他所能自立爲勢者，主要的

還在於漢城的部衆，因此他只有率領自己的部族往漢城而去，並開始進行有計劃地反抗傳統，時機成熟時，以計畫殺諸部大人，又奪回領導契丹部族聯盟可汗之位。至於阿保機的漢化問題，非本文主旨，不予贅述，這裏要提出的，是當時中原戰亂，漢民投奔契丹者甚衆，而阿保機乃採漢法漢制以安撫之，故而「漢人安之不復思歸，阿保機知衆可用……」（註二十三），似乎在漢民的心目中，只要能安定其生計者，都值得前往歸附，並不在於是否漢人政權，那麼我們在國史中看見許多漢人北投異域，與許多非漢人入奔中原，都應該是基於有某些共同的觀點了，「夷狄華夏」之分，實由於生活習俗及文化上的不同，但這都應是可以融合並習慣的。

在第二方面，阿保機承襲了游牧民族的一貫作風，以北亞草原各民族爲其主要對象了，他仍不斷的征討各個民族部落，除東北的渤海國，女真、奚、北方的室韋各部皆降服或擊滅，向西征突厥、吐谷渾、黨項、沙陀等，成爲主宰北亞之強權。

在第三方面表現出來的，正是此一時期北亞游牧政權對中原本土的關係，也是契丹積極策畫南進的時期。九〇七年阿保機即帝位，而朱全忠在中原亦篡唐自立爲梁，開五代之始，雖曰改朝換代，但中原之局勢完全同唐末一樣，終五代之勢亦皆如此，這給有心進佔漢地的契丹可汗良好的時機，但河北諸鎮一向跋扈，也因其最具實力之故，因之成爲契丹南進政策中最大的阻力，前面述及的盧龍節度使劉仁恭，就是契丹正面的一個勁敵。當阿保機之勢崛起於北，中原各政權實無力開塞出擊，並以契丹之勢足以影響他們在中原雄長之局，反皆欲倚之以爲外援，有些像隋唐

之際的突厥對中原的影響力一樣。值梁晉之爭，阿保機採取中立，又以遼交近攻爲謀，助長中原戰亂，實則在伺機打通南進之路，幽薊自當爲其第一目標，後幽州內亂，劉守光囚父守恭自立，其兄義昌（滄州）節度使劉守文與之攻戰，而平州刺史劉守奇則率衆降於契丹（註二十四），劉守光欲騎梁晉之間而有心南面王之，阿保機對劉氏兄弟之爭皆曾援助，但却無力攻佔幽州，實因幽州內亂，背後又有梁、晉強權爲援，阿保機尙不足下幽州而窺中原。九一三年，李克用之子存勗攻拔幽州，殺劉守光，阿保機不救，契丹之未能利用幽州之亂南進，而坐視晉兵奪佔之，恐係內部局勢不穩之故（註二十五）。晉得幽州之後，以勇將周德威守之，阿保機始將兵南下，河北既爲晉有，契丹與晉之間乃有戰爭；神策元年（九一六年）冬，契丹攻擊朔、蔚、新、武、媯、儒等州，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；而盡有其地（註二十六），當時李存勗已得魏博，正欲南下與梁爭天下，有盧文進之叛，引契丹兵入河北，並大敗周德威，進圍幽州百餘日，晉出精兵良將往援，力戰始退契丹（註二十七）。阿保機的幽州爭奪戰無功而返，但留下盧文進爲幽州留後，以作南進之先導，並且收容許多地方割據勢力，在於擾亂中原局面，以便入侵河北，如張文禮（註二十八）、王處直（註二十九）等，而後契丹又度南下，但復失利於新城、望都而返，主要原因是親契丹的定州王處直，爲其親晉之子王都所廢，重大的打擊了契丹之入侵，後又逢大雪，契丹人馬飢寒多死。這二次大規模的南進，可以說都無功而返，但對中原本土的震撼力是相當強大的，阿保機並未放棄南進的政策，他打算更進一步的大舉入侵，但以當時失敗的教訓中，知道務必傾

全國之師始有希望，於是不得不考慮到是否有後方的威脅，徹底掃平可能來自後方的敵人，才能全力南進，而欲去後背之敵，又恐中原政權乘虛出塞而掩其背，故而必先遣使通好中原，契丹大規模南進之軍事行動乃暫時停止。

天贊四年（九二五），阿保機親征渤海國，其國於唐中葉時，大祚榮建國，已歷二百多年，是東北一大勢力，「地直營州東二千里，南以新羅以泥河爲境，東窮海、西契丹」（註三十），在此不述其歷史（註三十一）。阿保機的用兵渤海，費時甚短，約半年即完全底定，改爲東丹國，即東面契丹國，以皇子突欲爲人皇王主其政，實行直接統治，納爲國土，而其地因漢化頗深，阿保機以之主政東丹，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（註三十二）。滅渤海國後，契丹勢益盛，「地方五千里，兵數十萬，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，盡有其衆」（註三十三），這是新增的勢力。當此後顧之憂消除後，阿保機正可傾力南進，可惜道死於扶餘（吉林農安），這個自契丹建國後，南進中原本土的國策，只得留給後來的繼承者耶律德光來完成了。

但在阿保機死前，史書記載了一則很重要的史料；即後唐使臣姚坤與阿保機會見於慎州（吉林農安以東）的談話（註三十四），這段談話在此也不作討論，但引數語可見阿保機對南進中原之野心：「（聞後唐莊宗李存勳被弒，李嗣源繼立爲明宗）曰：我兒旣沒，理當取我商量，新天子安得自立」，「……汝（姚坤）當先歸，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，其爲盟誓，與我幽州則不復侵爾矣」（註三十五）。

### 三、契丹遼的左右中原政局及其入主中原之失敗

九三六年阿保機死，其后述律總攝軍國事，稱制十六月。阿保機三子；長子突欲主政東丹，次子德光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詔統六軍，最具乃父之風，三子李胡驕縱殘暴，不能成大器。阿保機與述律后皆屬意於德光，乃使之繼承大統爲遼史上之太宗，至於德光與突欲之衝突，主要在於帝位之競爭，但在此似乎也可看出突欲所代表的是漢化集團，他本人及他的東丹國都有很濃厚的漢家皇室味道，而德光代表的正是游牧君長的可汗之風。突欲自德光繼位後，受到許多壓迫，這種契丹內部的糾紛，在中原的唐明宗當然不會放過，乃誘勸突欲出奔內屬，突欲的投靠中原漢人政權的例子，在國史中是可常見的，如匈奴之呼韓邪，柔然的阿那懷父子等。

耶律德光繼位之初，契丹的國力並未比阿保機時代強盛，反而有些投降的漢地將領在此時又投入中原的政權之中，如盧國用、盧文進等的奔唐（註三十六）。這可能有數原因：一是契丹易主之際，執政之述律后忌用叛降且握有兵衆之漢人，二爲後唐明宗招撫之功，三爲二盧本漢地人，其部衆甚或二盧本人思漢心切。這使契丹勢力減色不少的歸漢運動，似乎德光也無力阻止，致當中原後唐政權遭王都之叛時，契丹二度援王都皆無利而返（註三十七），這固因幽州勇將盧龍節度使趙德鈞之據有戰略地利，也實因無阿保機時代二盧之類的漢地將領，爲之奉命驅馳之故。至於唐明宗時中原強盛不差於契丹，也因李嗣源之力不差於耶律德光之故（註三十八）。契丹南



進之策至德光初期仍然受挫，趙德鈞之控有幽燕，正如阿保機時代劉仁恭父子一樣，扼住契丹入河北之門戶。河東方面，昔爲李克用父子之地，現仍爲後唐所守。這兩方面其一的突破，則將是契丹大舉入侵中原之正途，後德光控有中原，就因爲這二方面的政權，都有依契丹以雄據中原的心理，才使德光能伺機得呈。當時唐明宗是五代之世唯一能戰契丹而能和契丹者，若中原之政權能長久如此，則契丹終不能南進，更何論入主中原乎？惜明宗死後，中原政爭，適予契丹之良機。

耶律德光之南進，起於石敬瑭與李從珂之爭天下。唐明宗死後，三子從厚繼立爲閔帝，時朱弘昭、馮贇二人掌政，但當時位望以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，與河東節度使石敬瑭二人爲高，一爲明宗假子，一爲明宗之婿，「……平汴水滅梁室，致莊宗一統，集明宗大勳，帝（晉高祖石敬瑭）與唐末帝（李從珂）功居其最」（註三十九），朱馮二人思剷除石李之勢，以便能絕對控制中原政權，因之迫使李從珂終以清君側之名入立爲唐末帝，但真正的競爭應是才開始，李、石二人位望相當，及從珂卽帝位不免猜忌敬瑭，後終因徙鎮之舉，敬瑭乃反，二人野心之衝突終於公開化，至於唐閔帝、李從珂、石敬瑭三人之關係與當時政情，事專於五代中原之政治史，不欲在此討論，與本文有關者，乃是契丹如何能一再的南進受阻，而終又能入主中原，其間的歷史關係，就因緣於李石二人的爭奪中原政權。

石敬瑭拒末帝徙鎮之詔前，曾召開幕僚要議，其擬定之反唐原則爲「外告鄰方，北構強敵」